

南宋初期奏议文写作特点研究

范伟¹, 张丽丽², 王靖怡²

(1. 首都师范大学 文学院, 北京 100048; 2. 河北联合大学, 河北 唐山 063009)

摘要:从整体上对南宋初期抗战派作家的奏议文写作特点做一归纳:奏议文不仅含有刚大愤激的气势,还具有诚恳深切的感情,主要体现在作者反对投降、呼吁抗战的义愤心情上,表现出一种对国家、君主和人民忠心耿耿的感情。南宋奏议文的语言也别具一格,形成了与北宋奏议文迥然不同的语言艺术风格。

关键词:南宋初期;奏议文;写作特点

中图分类号:I207.2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2-349X(2015)01-0093-03

DOI:10.16160/j.cnki.tsxyxb.2015.01.024

A Research into Writing Characteristics of Papers to Emperors in the Early Southern Song Dynasty

FAN Wei¹, ZHANG Li-li², WANG Jing-yi²

(1. College of Liberal Arts, Capital Normal University, Beijing 100048, China; 2. Hebei United University, Tangshan 063009, China)

Abstract: The authors of this paper summarize the general writing characteristics of the papers submitted to emperors by combative writers in the early Southern Song Dynasty. These impressive and emotional papers reflected the authors' opposition to surrender, their appeal to fight back and their faithfulness to the country, the monarchs and the people. The papers, with their own linguistic style, are quite different from those in the Northern Song Dynasty.

Key Words: early Southern Song Dynasty; papers submitted to emperors; writing characteristics

宋代以前的奏议文以简洁明了为主要特色,到了宋代,随着知识分子地位的提高,参政热情的高涨,奏议文也逐渐呈现出议论化特色,长篇大论层出不穷。北宋早期,王禹偁、韩琦的奏议文奠定了议论的传统;北宋中期以欧阳修、王安石、苏轼的奏议文为代表,将奏议文写作推向最高峰;北宋后期,奏议名篇的涌现大有退潮之势,但以苏轼后学士人为主的奏议文写作,依然延续着宋奏议议论化的传统。北宋一朝的奏议文,大多以平易流畅的散行语言,征引详实资料,驱使多重手法做强有力的论说,意脉曲折而行文严谨清晰,为南宋奏议文写作奠定了基础。

北宋末期靖康之变的爆发给宋代文士以沉重的打击,国破家亡的痛苦让他们奋力呼号,所以南渡前后的奏议文少了冷静分析,多了慷慨直陈,少了几分议论化特色,却平添了几

分感发力量。这一时期的奏议文毫无疑问以抗战救国为主题,虽然其中也含有详细议论的长篇大作,但是代表时代最强音的仍是宗泽、李纲、岳飞、胡铨等人痛快直陈的短章上疏。他们在奏议中抒发激昂刚大的愤懑,表达深切诚恳的感情,句式多变,骈散结合,变换有致的语言,为宋代奏议的发展平添了几分新风貌。

杨庆存先生在《宋代散文研究》中将这一派散文的总体特征概括为“刚大愤激”^[1],但是这只能代表这些奏议文一方面的特色,事实上它们还具有诚恳深切的感情以及别具一格的语言,以下逐一陈述。

一、刚大愤激的气势

李纲在《道乡邹公文集序》中说:“文章以气为主,如山川之有烟云,草木之有英华,非渊源根柢所蓄深厚,岂易至耶?”

士之养气刚大,塞乎天壤,忘利害而外生死,胸中超然,则发为文章,自其胸臆流出,虽与日月争光可也。”^{[2]22}这可以说是南渡前后至南宋初期抗战派散文家的理论纲领,他们的奏议文也正是出于创作主体的“渊源根柢所蓄深厚”,从而可以“忘利害而外生死”,把本是应用文的奏议写得极有文采。

宗泽的奏议以自高宗建炎元年至二年五月期间,连上的“乞回銮疏”二十四通为主,诸篇所写内容大同小异:先讲明京城的重要性,京城人民与兵将对于皇帝回京的期盼,京城防备已经完善,兵力已经复苏,反攻金国指日可待,最后是表达北伐金国、迎回二圣的衷心。在宗泽的乞回銮疏中,几乎篇篇都有作者愤激心情的发泄,主要是对于高宗回銮的期盼和表达北伐复国的决心,有时宗泽用的是责备皇帝的语气:“陛下奈何不念四海生灵切切俟后之意,乃偏听奸邪之言,诿为时巡,驻蹕淮甸,不思我宗庙朝廷,祠享报上,垂拱视下;又不思我二圣、后妃、亲王天属蒙尘,朝夕怀想迎取之志;又不思我诸帝诸后,陵园庙貌,以时祭祀,所以貽厥子孙之情。”^{[3]339}用排比的句式,酣畅淋漓地直陈对于皇帝偏安的不满,可见愤激之至,文章的刚大气势也因此充溢。除了对于皇帝的责备,“刚大愤激”的气势还表现在作者的复仇决心上,“臣又自期,既以迎奉銮舆还都,臣当身率诸道之兵,直趋两河之外,喋血北廷,非特生缚其帅,直迎二圣以归,庶雪靖康一再之耻,然后奉觞玉殿,以为圣天子亿万斯年之贺,臣之心愿始毕矣”^{[3]335}。读之使人热血沸腾。

李纲抗战主题的奏议文以说理致用为目的,很少注意技巧,往往极陈己见,对于当前形势、形成原因和应对策略条分缕析,议论深入浅出,语言平实流畅,与北宋的范仲淹、欧阳修的奏议文风有相似之处。但他毕竟是经历过靖康之变的抗战派代表,字里行间流露出的依然是对于抗战的呼吁,是自己的恳切心志。故如宗泽一样,李纲的奏议也写得刚大愤激,如在《召赴文字库祗候引对劄子》中,针对眼前形势向徽宗皇帝条陈三策:

臣愚以谓今日之策有三:上策莫如亲征。讲求真庙幸澶渊故事,选将励兵,躬临训练,降诏问罪,涓日启行,以慑戎心,以鼓士气,驱逐丑虏,保完旧疆,此上策也。中策莫如坚守。夫京师,天下之根本也。宗庙社稷、朝廷宫室之所在,百官之所聚,密迩陵寝,中四海而临万邦。高城深池,有金汤之险;联营环卫,有虎貔之师。运漕东南以足材用,控制西北以威夷狄。天下无二,舍此安归?定坚守之计,励士民之心,效死为期,无毫发欲去之意。既务镇静,又施权谋,遣帅出师,分屯傍近要害之地,翼卫帝室。设使犬养之众敢肆凭陵,当如周亚夫御七国之策,坚壁勿战,以挫其锋,待其粮竭力衰,邀其归路,多设方略,一鼓破之。此中策也。下策为避狄之计,如太王去邠而居岐,臣有所不忍言。^{[2]129-130}

谏议三策,或战或守,但是坚决反对逃跑,以铿锵响亮之句传刚大愤激情怀,不仅能根据实际情况提出有针对性的策

略,而且句式灵活多变,错落有致。

岳飞作为一代抗金名将,他的奏议也如他的事迹一样振奋人心,岳飞写得最好的正是那些请求出战抗金的奏议文,如在《乞本军进讨刘豫札子》中说到:“陛下比者寝阁之命,圣断已坚,咸谓恢复之功,指日可冀。何至今日,尚未决策北向。臣愿因此,上禀成算,不烦济师,只以本军进讨,庶少塞嫫官之咎,以成陛下寤寐中兴之志。”^{[4]241}简短几句饱含一种英雄气概,这种气势其实就是作者心态的反映,恢复故土,迎回二圣。

此外,生活在南宋初期到中期的胡铨也写过精彩的奏议文章,他在《戊午上高宗封事》中说:

而陛下尚不觉悟,竭民膏血而不恤,忘国大仇而不报,含垢忍耻,举天下而臣之甘心焉。就令虏决可和尽如伦议,天下后世谓陛下何如主?况丑虏变诈百出,而伦又以奸邪济之,裨官决不可还,太后决不可复,渊圣决不可归,中原决不可得,而此膝一屈,不可复伸,国势陵夷,不可复振,可为痛哭流涕长太息也。^{[2]48}

文中用激烈的语气诉说对于王伦等主和派的痛恨,陈说议和绝不可为。他甚至说到:“臣备员枢属,义不与桧等共戴天,区区之心,愿斩三人头,竿之藁街,然后羁留虏使,责以无礼,徐兴问罪之师,则三军之士不战而气自倍。不然,臣有赴东海而死耳,宁能处小朝廷求活耶!”^[5]直言当斩卖国之人,刚大愤激之辞溢于言表。

二、诚恳深切的感情

“刚大愤激”诚然是南渡前后抗战主题奏议的显著特色,主要体现在作者反对投降、呼吁抗战的义愤心情上。这些奏议还表现出一种对国家、君主和人民诚恳深切的感情,这是学术界很少注意的,它们在情感的抒发上振聋发聩,对于表现创作者的形象也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比如宗泽所上奏疏:“顾臣犬马之齿,六十有九,此缘陛下委付之重,长患才力不任,惕惕忧惧。近日顿觉衰瘁,万一溘先朝露,辜负陛下眷恤怜悯之意,臣死目不瞑矣。使臣与官吏士民,望翠华回輶之尘,瞻仰天颜,俯伏百拜,然后臣退填沟壑,如生之年,死骨不朽。”^{[3]336-337}短短几句话,虽没有义愤责备,也没有复仇决心,但一个鞠躬尽瘁、精忠为国的老将领的形象却跃然纸上。所以宗泽奏议的感染力,不独有刚大愤激的抗敌决心,亦多有诚恳深切的感情流露。

又如李纲奏议中言:“臣荷二圣之知遇,悼孤忠之失图,虽心驰魏阙九重之中,而身在江湖万里之外,不获执干戈卫社稷,以伸臣子犬马之诚,疾首痛心,泣尽而继之以血。恭承召命,即日戒途,率湖南义兵,倍道前进,欲趋元帅行府,以造阙庭。而行次江淮,恭闻二圣羽卫北迁,远狩沙漠,痛愤彻骨,绝而复苏。”作者表现出怀恋二圣的心境和拳拳为国的忠心,感人至深,情感深沉恳切。

太学生陈东曾率诸生伏阙上书,乞用李纲,反对议和,他的奏议不仅具有刚大愤激之气势,也有恳切真情的流露。在

《上高宗皇帝第二书》中:“臣窃谓天下之事,何事最大?二圣北狩,玺舆未还。天下之人,虽贱如田夫,愚如野妇,每有一言说及二圣,必相痛哭,涕泪交流。又况陛下孝悌之至,神圣所钟,想见思念父母兄弟沙漠之苦,寝食俱废。”^[6]这几句话将上至皇帝、下至百姓的哀痛恳切之心摹写得淋漓尽致。

综上所述,南渡前后和南宋初期抗战主题的奏议文之所以振奋人心,就在于它们不仅承载了南宋爱国人士刚大愤激的抗战决心,而且包含诚恳深切而又真挚细腻的感情,这对南宋中期陈亮、辛弃疾、陆游等人同主题奏议文的写作影响深远,也是中国文学史上宝贵的精神财富。

三、别具一格的语言

这一时期的主战文人一般不在意于字句的雕琢,如岳飞之孙岳珂所编《金佗粹编·家集》序中说到:“先臣飞刻意于学,涉猎经史,尤喜《春秋左氏传》与孙吴之书,不为章句,不事华靡,直欲致之实用。”^[7]³⁹³又说:“其中心之蕴,谋略之所施,往往见于表奏题跋,吟咏之间,随笔敷露。”^[7]³⁹³以上评论,大体是指岳飞为文,以致用为上,以达情舒愤为主,对章句文采注意很少。陈东之弟陈南所作的《陈东行状》中也称陈东“为文章不事华靡,命意立言,必合风雅”^[8]。他们虽然不事华靡,但是在他们的奏议文章中,承载气势与情感的语言却别具风格。

这一时期抗战主题奏议的语言以散行为主,偶尔会有骈句,句式多样,变换有致。多用对偶和排比,读来极富节奏感与音乐美,尤其是整齐的四言句的运用,或用于描述情况,或用于展露心境,极适于文章气势的表达。简言之,这一时期抗战主题奏议多以长短错落的语言承载激愤恳切的感情。

如宗泽在建炎二年三月的《乞回銮疏》中说:“臣窃谓自敌人围闭京城,天下忠义之士,愤懣痛切,感厉争奋。故自广之东西,湖之南北,福建江淮,梯山航海,越数千里,争先勤王。但当时大臣,无远识见,无大谋略,低回曲折,凭信诞妄,不能抚而用之,遂至二圣北狩,诸亲骨肉,皆为劫持,牵连道路。”^[3]³⁴¹短短数语,以整齐的四言为主,将宋兵的忠诚、奸臣的丑恶以及国家的遭遇刻画得淋漓尽致,铿锵有力的节奏对于激发读者的共鸣十分有效。

陈东在描述一种情况时,多用四言句,如在首次上书时,

历数六贼之罪恶,其言蔡京之罪,则曰:“京天资凶悖,专权跋扈,首为乱阶,陷害忠良,进用险佞,引置子孙,尽居要途。变乱祖宗法度,快其私心;窃弄朝廷爵赏,固其党与……”用整齐的语言将奸相蔡京的丑恶嘴脸描画殆尽。

岳飞在《南京上皇帝书略》里也用四言句陈述观点:“为今之计,莫若请车驾还京,罢三州巡幸之诏,乘二圣蒙尘未久,虏穴未固之际,亲帅六军,迺迺北渡。则天威所临,将帅一心,士卒作气,中原之地,指期可复。”^[4]²²³行文步步深入,赋予文章以极强的节奏与气势。

四、总结

南渡前后至南宋初期的社会环境,决定了这一时期的奏议兼具刚大愤激的气势和细腻诚恳的感情,语言的议论化虽不比北宋文士,但是骈散结合、对偶排比等句式多变,别具一格,这些特点决定了这一时期抗战主题奏议深具感染力,并对后来南宋中期抗战主题奏议创作影响深远。

参考文献:

- [1] 杨庆存.宋代散文研究(修订版)[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1:233-234.
- [2] 曾枣庄,刘琳.全宋文:第172册[M].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06:22.
- [3] 曾枣庄,刘琳.全宋文:第129册[M].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06.
- [4] 曾枣庄,刘琳.全宋文:第196册[M].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06.
- [5] 曾枣庄,刘琳.全宋文:第195册[M].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06:49.
- [6] 曾枣庄,刘琳.全宋文:第175册上[M].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06:214.
- [7] 岳珂.金佗粹编:第十卷[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393.
- [8] 曾枣庄,刘琳.全宋文:第182册[M].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06:329.

(责任编辑:李高峰)

(上接第78页)

- [5] 钦定四库全书·韩非子:第729册[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690.
- [6] 吕氏春秋[M].庄适,选注.北京:商务印书馆,中华民国36年:69.
- [7] 释道世.法苑珠林[M].周叔迦,苏晋仁,校注.北京:中华书局,2003.

- [8] 黑田彰.阳明本孝子传的成立[J].京都语文(第14号),平成19年:90.
- [9] 皇甫谧.高士传[M].刘晓东,校点.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6.
- [10] 范曄.后汉书[M].北京:中华书局,1965:874-875.

(责任编辑:白丽娟)